

再论《要十分重视粮食这种特殊商品》

——来自粮食、猪肉价格上涨的深层思考*

杨作书¹,杨雪松²

(1.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2. 重庆市第六十六中学,重庆 400042)

[摘要]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粮食价格的波动将会触及国家经济安全神经,粮食价格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粮价的波动必定会引起群众的不安。因此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不放松是一种稳定粮食价格的根本办法。

[关键词]特殊商品;价格波动;经济安全;增产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6-0008-07

十四年前,因国家再次调整粮食购销价格,粮食问题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针对当时各种不同议论,我撰写题为《要十分重视粮食这种特殊商品》一文,在《求是》(内部文稿)1994年第17期刊用。该文分析了粮食的连锁波动效应,指出了因种粮比较效益低而引发的新问题,强调了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不能动摇的建议。十多年过去了,粮食问题并未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自2003年以来,国内粮食价格猛然走高,随之而来,油脂、肉禽及其制品等食品类价格一路攀升,粮食及猪肉等一度出现供需紧张局面。粮食价格上涨再次引发全国上下的关注和不安。我们认为,粮食价格上涨只是一个货币现象,粮食价格为什么上涨,是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的。对此,本人撰写再论《要十分重视粮食这种特殊商品》一文,试作理性回答。

一、对粮食这种特殊商品的再认识

第一、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对此,马克思早就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劳动是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数量”;“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

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的生产时间就愈多”。实践证明,粮食产业是其他各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粮食是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物实保障。没有农业、没有粮食,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第二、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具有需求刚性的商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这是一个非常朴素而分量特重的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能够生活,首先要求衣、食、住、行及其他东西”;“在任何时候任何发展阶段,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食物,然后才能去做其他事情”。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农业兴,百业盛,农业动,天下震的现象长期存在,并大范围反复发作,这一事实表明,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是中国特定条件下顺则昌、逆则亡的不可逆转的刚性规律。

第三、粮食价格上涨触及粮食安全神经

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作用下,粮食波动是通过更多的中间环节牵动国民经济波动。我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仍然偏高,即农村为45.6%,城市为37.1%。虽然人均直接消费的口粮逐年下降,但饲料粮和以粮食

* [收稿日期]2007-09-23

[作者简介]杨作书(1942-),男,重庆市人,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杨雪松(1970-),男,重庆市第六十六中学,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政治思想教育。

为基础的动物性食物及其加工食品的消费量却逐年上升。资料显示,每生产一斤猪肉,用大米需要 3.5 公斤,用玉米则需要 2 公斤。粮食价格波动不仅影响到粮食的供给和需求,而且必然影响到饲料粮和所有食品价格波动,导致职工消费支出和工资成本的上升,进而导致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近几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逐月上涨,5 月上涨 3.4%,6 月上涨 4.4%,7 月上涨 5.6%,1—7 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3.5%,创出 10 年来的新高。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动力是食品价格快速攀升,据测算,CPI 上涨的 80% 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又主要是由粮食及猪肉价格来拉动。因为我国每年消费口粮 5500 亿斤左右,饲料用粮 3000 亿斤左右,工业用粮 1000 亿斤左右,种粮 230 亿斤左右。粮食价格上涨对饲料,进而对农副产品价格有着直接影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又会影响到下游加工食品的价格,这一系列上涨传导最终引起了 CPI 的上涨。据国家统计局 8 月 13 日公布的最新统计,今年 7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5.4%,粮食价格上涨 6.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45.2%,油脂价格上涨 30.1%,鲜蛋价格上涨 30.6%,鲜菜价格上涨 18.7%。由于我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通货膨胀均与粮食价格上涨有关,而粮食在 CPI 中的权重较大(以粮食为核心的食品类占 CPI 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此次粮食价格上涨再次引发关注。

第四、粮食的特点是具有公益性、弱质性、风险性和利益的外在性

农业的劳动对象是生物体,是通过人们的劳动去强化或控制生物的生命过程来生产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要素的各种食物的唯一部门。粮食等各种食物不仅能满足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能带来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多种效用,公益性十分明显。粮食的弱质性和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生产周期长,供给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粮食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当期的生产计划基本上是根据上期的价格走势确定,无法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供给缺乏弹性。产出水平往往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产出太少时,面对市场机会无能为力,错失赚钱的机会;产出太多时,因产品大多具有鲜活、易腐、不耐储存的特点,只能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使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其二是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

粮食生产的根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因而面临着双重风险压力。一方面,粮食生产可能会遭遇洪涝、干旱、沙尘暴、病虫害等灾害,生产形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的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再加上众多分散经营的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不足,在生产决策上经常处于被动盲目的状态。而粮食价格的实现要取决于市场供求状况,在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的情况下,价格波动较为剧烈,存在着很大的经营风险。其三是回报率低。粮食生产普遍存在资金周转缓慢、固定资产利用率偏低、投资周期较长和资金利润率不高的情形,对逐利资本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粮食生产利益的外在性,是指粮食生产的利益往往分层流到一些后序产业,许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都以粮食为原料,而收益往往高于粮食生产。

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工业化、社会化的水准越高,分享农业和粮食产业的成果越多。但是,在 GDP 的表示中,并未显示出第二、三产业分享农业和粮食成果的价值。与此同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也未能使农业和粮食产业得到足够补偿。所以粮食成了一种不甚值钱但又是最宝贵的特殊商品。

二、粮食问题须警钟长鸣

(一)粮食问题严峻,已成世界难题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农田的减少,缺水的加剧,气候的变暖,世界粮食的前途令人担忧。

按农作物收获情况,世界上的国家可分为三类:富裕的、粮食可自给自足的国家;穷国;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富国。北美,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属于第一类国家,它们的农业生产除满足本国居民需要之外,还向国外大量出口剩余粮食。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稳定的农业生产制度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增长能达到需要的程度。

拉丁美洲国家、非洲沙漠国家、中南亚的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属于第二类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多达 30 多亿,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它们的问题是不能生产居民所需要的足够粮食,需要从国外进口来补缺。它们的人口不断增加,从而破坏了经济的平衡。

第三类国家像日本和新加坡,中东部分阿拉伯国家等,它们的国土面积小,这些国家不能为它们

的居民生产所需要的粮食,但是它们有钱,可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粮食。它们也积极发展农业,如日本的大米生产就能自足,只是花费较高。

资料表明,粮食自给和发展较快的国家仅占 14.6%,其它 85.4%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缺粮国的地位,其中 94 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到 2000 年的粮食产量增长率为 2.6%,而同期的粮食需求增长率则为 2.7%。以上述增长率计算,94 个发展中国家到 2000 年的粮食总产量达 11.52 亿吨,而粮食需求总量则增长到 12.47 亿吨,缺口达 9500 万吨之多。世界粮食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出现非常危险的停滞甚至下降趋势。从 1950 年到 1984 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 2.6 倍,从 1984 年到 1993 年全球粮食产量每年只递增 1%。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1993 年全世界有 13 亿人食不果腹,其中近 8 亿人长期营养不足。在非洲,40%的幼儿因饥饿而发育不良的儿童占总数的 33%;在南亚,这个比例高达 63%。10 年前,第一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到 2015 年,使全世界 8 亿多饥饿人口减少一半,即每年平均要减少 2200 万饥民。10 年过去了,目前全球仍有 8.4 亿人经常挨饿或长期营养不良,约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世界粮食问题为什么如此严峻?从自然灾害方面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和土地荒漠化正越来越严重。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已经达 36 亿公顷,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28%,并正以每年 500 万到 700 万公顷的速度扩大,而人均可耕面积已从 1970 年的 0.38 公顷降低到 2000 年的 0.23 公顷,到 2050 年可能减至 0.15 公顷,减少将到 50%。与此同时世界人口正在快速增加。1997 年全世界有 57.7 亿人,2002 年是 61 亿,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将可能是 80 亿,但世界粮食总产量一直在 18 亿吨到 20 亿吨之间徘徊。战乱也是导致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意大利《晚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非洲,“缺吃的,但从来不缺武器”。“干旱和战争摧毁了文化,把人们赶出田地,制造难民和乞丐”。

(二)我国粮食问题不容乐观

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为此我国的粮食问题一向为世人所注目。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的成功变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生产与供给逐年好转,由过去的供给不足,发展成为供需平衡有余,部分主产区出现过剩,这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供求已

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但是,我国粮食生产很不稳定,特别是 1990 年以来,曾经多次发生粮食减产,199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44624 万吨,1991 年下降到 43529 万吨;1993 年为 45648.8 万吨,1994 年下降到 44510.1 万吨;1996 年为 50453.5 万吨。1997 年下降到 49417.1 万吨;1998 年为 51229.5 万吨,创历史新高;此后连续 5 年减产,到 2003 年下降到 43069.5 万吨,比 1990 年的产量还要低;2004 年到 2006 年又实现连续 3 年粮食丰收。由此可见,我国的粮食已开始进入基本平衡与年际间波动并存的阶段。从宏观视野看,由于以下情况,我国粮食问题不容乐观。

第一,粮食生产潜力难以有大的挖掘。粮食生产取决于粮食面积和粮食单产这两个主要因素。

首先,耕地面积锐减严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也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国以土为本,与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相比,土地不仅是劳动对象和资金的投入对象,又是一种生产资料和投入资本。土地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离开土地就无所谓农业,就无所谓粮食生产。我国是土地资源大国又是土地资源小国,我们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国土总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口多,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数的 1/3。而在我国国土总面积中,不能或难以利用的沙漠、冰川、戈壁、石山与高寒荒漠又占去相当大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土地总面积的 1/6 陷入了水土流失。如今沙化的土地已经占我国面积的 13.5%。我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现有宜农荒地 5 亿亩,其中可开垦为耕地的只有 1.7 亿亩。截至 2006 年 10 月 31 日,我国共有耕地 18.27 亿亩,人均不到 1.39 亩,仅为世界人均数的 1/4。在历史上我国人均耕地远远高于现在,如大汉王朝人均 9.6 亩,唐代、明代人均 12.6 亩。在全世界 26 个人口 5000 万以上的国家中,我国人均耕地仅高于日本和孟加拉国,居第 24 位,相当美国的 1/9,泰国的 1/4,印度、巴基斯坦的 1/2。

我国耕地减少十分严重,从 1957 年到 1986 年近 30 年间,全国累计净减少耕地 2.3 亿亩,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耕地的总和,平均每年净减少 790 万亩。1986 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实

施后,耕地锐减的趋势一度得到控制。但最近几年来,又重新反弹: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到2000年10月底降为19.4亿亩,2005年10月降为18.31亿亩。“十五”期间年均净减少耕地1848万亩。1996年以后的10年间耕地减少了1.2亿亩。截止2006年10月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又比2005年度的18.31亿亩净减少了460.2万亩。人均耕地也由1996年的1.59亩降为1.39亩。据专家测算,到2010年和2030年,如果我国粮食完全自给,需要耕地分别为19.2亿亩和19.47亿亩。如果实现粮食95%的自给目标——这是1996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确定的目标,则需要耕地分别为18.24亿亩和18.5亿亩,若耕地保有量每减2000万亩,粮食自给率将下降一个百分点。可见,耕地面积如此规模地减少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一般来说,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建设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占用一些耕地难以避免。但如此大幅度的占用,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在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尤其无法承受,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乱占滥用。据分析,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出现了失控的圈地大潮,80%的违法占地涉及地方政府。我国耕地锐减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征地卖钱,“开发区”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圈地”赚钱,房地产开发商以“造城市、造大学城”的幌子牟取暴利,有背景的“地虫子”以廉价的高尔夫球场用地行建别墅敛财之道……房地产、开发区、高尔夫球场是导致土地大量减少的罪魁祸首。如2003年我国有开发区6000多个,占地面积达到3540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台湾全省(包括所有岛屿)的面积,比我国从古至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3250平方公里还要大。有40%的开发区开而不发,造成大量耕地闲量和失地农民。近十年来,党和政府为严格禁止乱占滥用耕地,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严厉禁止圈地潮的效果并不理想。中央政府越是严厉禁止,一些地方政府与商家越是在资源稀缺中看到了无限商机,权钱勾结越是加大了圈地狂潮。据土地专家估计,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达5505亿元,占同期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092亿元的1/3;2002年到2005年四年中,挂牌招标出让面积占出让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14.57%、26.81%、28.86%和35.06%,全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100亿元以上,土地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通道。

其次,粮食单产提高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单产大幅度增加,从1978年的168公斤增加到2005年的309公斤,总增幅为141公斤,平均每年增加5公斤。由于单产的基础水平已经比较高了,粮食单产增加的速度在一段时期会有所减慢。粮食单产难度加大,主要是基于粮食生产自然条件日益恶化。

一是自然灾害多,并有加重趋向。目前,我国每年平均农作物受灾面积约占农作物总面积的1/3。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目前仍有62%的耕地是靠天吃饭。这意味着要追加更大的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否则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

二是水资源严重短缺。即使南水北调得以实现,对粮食生产也没有多少作用,它主要是解决今后北方城市供水的严重不足。我国人均占有水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已接近严重缺水边缘。水资源紧缺已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瓶颈,每年因干旱损失粮食近300亿公斤。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水资源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严重污染又使缺水现状雪上加霜。本世纪初,我国将出现全国性水资源危机,对粮食生产将构成严重威胁。

三是气候变暖加剧。我国经历4年编制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和今年2月2日联合国发布全球变暖报告指出:地球温度已经创下一万多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上个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6℃。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1.4℃—5.8℃。就我国来说,地表气温将继续上升,其中北方增温大于南方,冬春增温大于春秋,以现在为基准,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2.1℃,2030年增加1.5℃—2.8℃,2050年增加2.3℃—3.3℃。全球气候变暖有90%的可能性是人类使用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造成的。去年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33%,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地球升温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动植物的生活,生物种类将大量灭绝,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粮食产量波动幅度增大,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10%;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将下降37%,气候变暖将严重影响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第二,人均产量低,且人口迅速增长而带来的粮食需求量的刚性增长。

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多,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为 300 多公斤,改革开放以来,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和超过 400 公斤年份只有 1996 年—1999 年。目前,我国人口在日益膨胀,每年新增人口达 1600 多万,相当于每年增加三个青海省的人口或两个瑞典国家的人口,每年要多生产 1 亿多吨粮食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现在我国总人口已超过 13 亿,而耕地却在急剧减少,这一严峻形势,令人十分担忧。减地要减粮,增人要增粮,按照中国的膳食习惯,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均粮食需求约 400 公斤计算,总需求将达到 5200 亿公斤,与可望达到的 5000 亿公斤相比,还差 200 亿公斤。预计到 2010 年、2020 年和 2030 年总人口分别为 13.7 亿、14.6 亿和 15 亿,则对粮食的需求分别为 5480 亿公斤、5840 亿公斤和 6000 亿公斤,与可望达到的 5000 亿公斤相比,分别还差 480 亿公斤、840 亿公斤和 1000 亿公斤。回顾历史,我国粮食产量从 2000 亿公斤跨上 2500 亿公斤、3000 亿公斤和 4000 亿公斤台阶,分别用了 5 年、4 年和 7 年。可见,在今后二十多年里,粮食从 5000 亿公斤增至 5200 亿公斤和 6000 亿公斤,其难度是很大的。

第三,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造成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低。我国目前有 2.5 亿农户,耕种了约 18 亿亩土地,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耕地,依靠这样一块土地面积生产粮食,依靠一个好的市场行情和好的气候条件,平均每个农户每年也能得到 3000 元左右的收入。除了生产费用,所剩无几,若遇天灾,亏本是经常的事。很多农民反映,种粮保口粮,赚点油盐钱还可以,要靠种粮赚钱致富,难上加难。农民虽弄不清什么是“比较效益”,但却始终在进行着“效益比较”。由于种粮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出现“农业大国不愿当农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平均利润学说告诉我们,等量资本投入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是他们在权衡了各种利益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抉择。由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在全国耕地锐减的情况下,多年来农村不少地方的农田杂草丛生,抛荒或半抛荒的现象十分普遍。

二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低。多少年来我们年年讲“三农”,但党和政府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各项政策被一些基层干部贪污了,使“三农”政策不贯彻、不落实、不兑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成就无比巨大,但成就主要表现在城市,农业、农村、农民并

未与城市人一样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正如一些流行的说法:“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每个城市都能找到曼哈顿的影子”。城乡差别大,农民社会地位低。我原以为看不起农民的只有个别浅薄的城里人,可现在连农民的后代都看不起农民了,连农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了,还能有谁去热爱我们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不能说不严重。农业大国以后谁来当农民?谁来种粮食?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粮食价格回归呈上升态势不可避免。

粮食既然是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要遵循价值规律。它有价值,其价值是生产粮食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有价格即生产价格,这种生产价格是由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构成的。所谓成本价格包括粮食生产资料消耗(物化劳动消耗)和粮食生产者劳动消耗(活劳动消耗);所谓平均利润是指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使生产要素流动或转移,要求等量资本(生产要素)投入获得的等量利润。价格以价值为基础,随供求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价格是低于其价值的,它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粮食回归呈上升态势是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于国于民都不是坏事,关键是要让价格回归的实惠要真正落到种粮农民手中。现在人们将粮食价格回归呈上升态势笼统说成是粮食价格上涨,严格说来是不确切的。至于少数经营者或行业协会趁粮食价格回归之机合谋串通涨价,哄抬价格,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必须严厉禁止,坚决打击。

为什么粮食价格回归呈上升态势?这主要是以下原因:

一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粮食是种特殊商品,尽管它的供求关系存在刚性,但仍会遵循市场的供求规律。一般来说粮食供给弹性较小,因为粮食综合供给能力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即或价格上升,也并不一定得到大幅度增产的回报,因为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不是价格而是综合生产能力。而决定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因素主要是:粮食市场体系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国家粮食储备的规模和布局、粮食物流体系的保障程度和粮食宏观体系的运行效率等。只有当粮食综合流通能力非常强,粮食生产到消费的通道极其顺畅且通达时间接近于 0 时,综合粮食供给能力才等同于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相反,粮食需求弹性较大,因为除了人们口粮需求具有刚性外,大量的农民由粮食生产者变成了粮食消费者,至今轻工业所需原料,仍有 67% 来自农产品,随着粮食加工用途和饲料用途的不断开发,相关产业链的运行和产业组织的竞争格局以及乙醇燃料热等,供不应求经常存在。按价值规律,粮食减产,出现供不应求时,价格要上升;粮食增产,出现供过于求时,价格要下降,于是便会发生“谷贱伤农”,“粮多伤心”的情景。至于最近实现连续三年丰收,为什么社会出现“增产涨价”反常现象呢?这是由于政府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产生的“托市”作用。该政策的实施使大量粮源被国家控制,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了,但市场供应量不增反减,说到底这这也是一个供求问题。

二是化肥、农用柴油、农机具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成本加大,出现成本推动型价格上升。这种情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三是受国际粮价暴涨的影响。对我国粮价波动问题,必须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分析。由于各种原因,全球农业的生产能力近年来已不可避免的出现下降,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减弱,从而导致农产品供给增长受限。2002 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粮食大幅度减产,小麦价格暴涨。2003 年欧洲粮食严重减产,世界粮食库存创历史新低,国际市场粮食涨价。根据美国农业部 2007 年 3 月公布的全球农产品供求数据,小麦从 2004 年—2005 年度的 6.28 亿吨下降为 2006 年—2007 年度的 5.93 亿吨,粗粮从 2004 年—2005 年度的 10.14 亿吨下降为 2006 年—2007 年度的 9.66 吨。与此同时,源于发展中国家和替代能源的农产品的需求近年来稳定增长,全球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出现重要逆转,使农产品价格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走高,这就必然影响我国国内粮食价格波动。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不出现垄断,最好不要去干预商品价格,只要全球范围内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改善,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就很小,而食品的价格也就没有理由下跌。不顾供求矛盾人为去平抑食品价格,实际上打击了食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刺激了消费者购买食品的积极性,从而潜在地减少了供给量,增加需求量。

三、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

我国的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国内自己来解决,如果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帮不了

我们,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靠进口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目前,我国粮食产量为 5 亿吨左右,而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不过 2 亿吨,把世界 2 亿吨贸易粮食都拿到中国来,也养活不了中国人,中国人还是要自己养活自己。为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抓好国内粮食生产。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重要性认识

以农业为基础是中国特定条件下的一条不可逆转的刚性规律,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短腿的局面远未根本改变。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包括农民投资取向在内的经济决策往往忽视甚至悖逆以农业为基础的规律。这集中表现为强化农业既定方略贯彻到位率不高,“口号农业”几成普遍现象。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困难喊农业,农业好了忘农业”现象仍在反复发生,使粮食生产走着扭秧歌的步子。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无工不富”的呼声高涨,几乎湮没“无粮不稳”,造成了连年粮食入库困难;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有钱就有粮”的误导下,南方五省粮食大幅度减产,引起朝野震动乃至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进入 21 世纪以来,又对农业基础的强化程度和农民的富裕程度估计失误,多方争吃“唐僧肉”,农民负担一度成灾,在种粮比较效益下降等综合因素的拉动下,农民大量弃农弃耕,致粮食产量几度滑坡。我们要改变那种平时遗忘“三农”,鄙视“三农”,当粮食、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吃的问题紧张的时候,才想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维定势,改变“经济上去,粮食下来”的自发倾向,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实行“米袋子”省长责任制,自觉地抓紧粮食生产不放松。

第二、要把中央关于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调动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不解决种粮不赚钱问题,谈何粮食安全?由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和机会成本高的现实依然存在,粮食产业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竞争挤压的弱质性依然没有改变,而粮食生产又具有效益的社会性,利益的外在性。对此,最近几年来,特别是 2002 年以来中央以提高粮农比较利益为目标,出台了包括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免征农业税、屠宰税等各项支农、惠农和扶持保护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明确而具体,可操作性强。现在的问题是宣传到位,贯彻落实到位不走过场,让种粮农民的

腰包真正鼓起来,把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调动起来。

第三、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长期以来的种种制度安排,都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以保障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明显的对农民不公平为代价,以换取国民经济效率和市民的福祉。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过去的长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据计算,到 2000 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相对量大约依然达到 60%—70%。我们要确立一种政策思想,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把第二、三产业分享第一产业的成果,适度而合理地再返还给农业和粮食产业,这也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的措施。

第四、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制度改革是我国释放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承包制不能确保粮农获得稳定的地权,农户只种地不养地、撂荒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乱占滥用耕地的情况屡次发生得以说明。要通过改革,探索确立一种新型的权利与收益分配结构,赋予农户长期土地使用权,确保耕地面积不再减少,以激发和释放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潜能。

积极推进我国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根本所在。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那些主要劳力向非农转移、或不依靠农业作为生活来源的农户将承包的责任田转移到种田能手之中;或对“四荒”使用权实行拍卖或承包经营;或联户承包、股份合作式及其他形式的农业集体经营、开发;或以企业为龙头的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开发;或以农户为本体的内涵式规模经营,走资源的深度开发、异地开发和综合利用之路,加大对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五、全面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种粮生产节本增效,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努力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为此,要普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大良种推广力度,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大力推广增产增效的先进适用技术,增加重大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补贴,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开展技术咨询和服务。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第二章)[C]. 重农学派[A]. 1972. 22—2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四十七章)[C].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A]. 1974. 885.
- [3]马克思.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A].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4 卷)[C]. 117—119.
- [4]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Z]. 中发[2005]1 号, 2005—12—31.
- [5]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Z]. 中发[2007]1 号, 2006—12—31.
- [6]李瑞环. 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1994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Z].
- [7]温家宝. 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A].
- [8]徐振宇. 从全球农产品供求矛盾看国内食品价格上涨. 中国改革报, 2007—6—15.
- [9]聂华林,王志升.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完善粮食政策的思路[N]. 中国经济时报, 2004—12—31.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discussion on Paying Attention to Grain which is a special goods

——Thinking on the rise of the price of grain and pork

YANG Zuo—shu¹, YANG Xue—song²

(1.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Chongqing No. 66 Middle School, Chongqing 400042 China)

Abstract: Grain is a special goods and the vibration of the price of grain touches the nerve of national economic safety. The price of grain is very much concerned by all the people and is related to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s a result, the vibration of the price of grain is certainly to disturb the people. Thus, the basic method is to consolidate grain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price of grain.

Keywords: special goods; vibration of the price; economic safety; measure for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